

《史記》俠客人物衝突及其悲劇意識 之研究

劉榮傑

美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陳麗珊

大仁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要

本文分爲五單元，第一單元對探討對象－俠客下定義，並說明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二單元就史記刺客和俠客人物之產生及其行爲作解析，藉以理解司馬遷爲他們立傳的動機。第三單元探討先秦刺客的衝突事蹟及司馬遷爲他們立傳時所散發出的悲劇意識，本單元歸納出俠客勇於犧牲的精神依據在於誠信與報知遇之恩，這些理念在中國民間有其社會需求，並且影響著後代。第四單元探討西漢游俠所遭遇的衝突及其悲劇意識，與先秦不同的政治背景下，西漢游俠亦能展現其精神特質，在當時擁有顯赫的聲名；然與先秦相比，先秦之俠客大都死於刺殺的對象，而西漢的游俠大都死於統治階級，往往以悲劇收場。第五單元爲結論，在司馬遷的筆下，這些俠客閃爍著睥睨生死的忠烈精神，顯然和司馬遷的際遇及其格特質有關，故能引起很大的共鳴，從本文亦可窺探司馬遷內心世界之一隅。

關鍵詞：俠客、刺客列傳、游俠列傳、衝突、悲劇意識

壹、前言

在中國的武俠小說中，往往塑造一些急公好義、勇於犧牲的英雄人物，他們行事有原則，具正義感；雖然其行事不見得合乎王法，但卻能替天行道，為人紓解不平，這些人我們稱之為俠客。俠客人物取材於現實人生，在現實人中不乏具有俠客行事風格的人物，司馬遷本身即具有深摯的俠士情懷¹，他在撰寫歷史人物時，自然會留意於俠客人物在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乃彙為〈刺客列傳〉和〈游俠列傳〉：

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作〈刺客列傳〉。

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史記·自序〉）

在為這些俠客人物作傳記時，我們發現司馬遷主觀情感的投入，從他所凸顯的俠客人物之人格特質，充分展現了司馬遷的生命價值觀——生命的意義不在於物質和生理上的滿足，而在於精神的追求和心靈上的寄託。對於俠客人物在追求生命理想的過程中所積澱的悲劇意識，司馬遷往往抱持同情的態度將其充分地展現出，讓俠客人物蒙上些許悲劇英雄的色彩。悲劇主要是透過「衝突」來突顯人類在面對不可規避的力量時所表現的不屈，從而令悲劇人物在表面的失敗中獲得精神上的勝利。在衝突的過程中，悲劇人物所觸犯的蒙羞或可怖事件、及其所遭受的痛苦，引發悲劇人物或讀者（或觀眾）產生淨化而獲得知識；讀者或觀眾亦因恐懼及哀憐等悲劇情緒，在具備心理距離的環境下得以宣洩而獲得悲壯（或崇高）的美感經驗²。悲劇由原始的一種祭祀型式發展為審美範疇上的一種藝術特徵，它的適用性可延伸到中西的各種文體。人類在發展的過程中，和宇宙、人生難免會發生矛盾衝突，這是歷史進展的自然規律，無從規避。人類在歷史的舞台上時常扮演著悲劇的角色，文學家或藝術家自然會將這些衝突的歷程表現在各種作品之中。本文從悲劇的角度探討《史記》的俠客人物，藉以窺視司馬遷如何展現他的俠士情懷。

貳、《史記》中的俠客人物的行為特質

在《史記》中，集中描寫俠客傳記的有〈刺客列傳〉和〈游俠列傳〉，〈刺客列傳〉蒐集先秦俠客，〈游俠列傳〉則蒐集漢朝俠客。刺客和游俠有許多共同點：如「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隕困」、「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也」、「以軀借交報仇」（〈游俠列傳〉）等這些游俠特質也存在於刺客的身上。但仔細辨析，兩者之間仍存在著區別：游俠志在扶危救

¹ 參見陳桐生《史記名篇述論稿》頁 267—271。

² 參見劉榮傑《史記悲劇意識發微》2008 年，南台灣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困，施恩而不圖報答；刺客則因為受到知遇之恩而捨身相報。游俠濟人之困是體現在多方面的，而不主以軀借交報仇一端；刺客則專門履行為恩立亡命行刺義務。所以刺客的人生道路遠比游俠窄得多，生命色彩也要比游俠悲壯、激烈。然司馬遷所要凸顯的，都是他們精神領域上的積極面，具有相似性，所以本文將他們合併稱為俠客，以利從歷史的發展次序上進行探討。

俠客的產生，固然有地緣因素，如〈史記·貨殖列傳〉載：

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儻伎，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

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

〈漢書·地理志〉亦載：

吳越之民好用劍，輕死易發。

朱子《詩傳》說：

秦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

但主要是政治因素所激成。〈刺客列傳〉所載之人物集中在春秋、戰國時代。從春秋初期開始，周室衰微，政歸諸侯。諸侯之間弱肉強食，連年征戰不息，四海沸騰，強國爭霸，弱國爭存，大欺小、強欺弱的事情時常發生。司馬遷在〈史記·自序〉中說：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到了戰國時代，各諸侯統治集團爭權奪勢、互相殘殺更加劇烈。張蔭麟先生曾比喻道：

春秋時代的歷史大體上好比安流的平川，上面的舟楫默運潛移，遠看彷彿靜止；戰國時代的歷史卻好比奔流的湍瀨……論世變的劇繁，戰國的十年每可以抵得過春秋的一世紀。³

社會在分裂、動蕩中進行。諸侯之間長期的戰爭及諸侯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給人間帶來了重大的災難，社會上呈現了混亂和黑暗，人間有眾多的不平。在這種情況之下，一些存有原始氏族遺風的民眾，一些有原始正義的觀念、有血性之勇的烈士奮起維護公道，抱打不平，扶弱抗強，救人危難，俠客於是盛行於春秋戰國，這就是所謂的「亂世天教重俠游」。

此外，春秋戰國時代俠客的興起也是特定文化環境下的產物。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剛健奮發、人格力量大發揚的時代，是一個士林階層揚眉吐氣的時代。多元分裂的政治局面促使各國諸侯貴族展開激烈的人才競爭，而諸侯貴族競相尊士喚醒了士林階層的自我與自尊意識。不同層次的士林人物都想在思想理論、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等方面慷慨立功，力圖在最大的程度上將自身內在的價值對象化，以此獲得社會對自身價值的承認以及由此而來的普遍尊重。荀悅在《漢紀》分析游俠如何崛起挺生時說：

凡此三游（游俠、游說、游行）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甚焉。上不明下

³ 參見張蔭麟《中國上古史綱》頁110。

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廢弛，以毀譽為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為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為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厚薄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疏而舉筆。善惡謬於眾聲，功罪亂於王法。……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思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眾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義，私務眾於官事。於是流俗成矣，而正義壞矣。

蘇軾《東坡志林》對游俠的產生，亦有相應的論述⁴。他認為智、勇、辯、力四者，是天地間最傑出的人才，他們大都不能「惡衣食而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如果先王能分天下財富與此四種人共享，讓他們有職可守，自然就能安其心，他們就不會影響其他百姓謀反作亂。如六國之君能蓄養這批人，使不失職，結果「少安而不即亡也」。秦始皇、秦二世初欲逐客，虧得有李斯諫阻；兼併天下之後，又以客為無用，任法而不任人，這批人才既不能「槁項黃馘以老死于布褐」，又耐不住「輟耕太息以俟時」的寂寞，自然要斬木為兵，揭竿而起的。

回溯春秋以前封建全盛期，井田未壞，所謂士者都為主上所養，安姓安於耕鑿，很少有浮游無食之人；及封建、井田制度破壞，諸侯大夫亡國敗家之事接連發生，最後使得士人「降在皂隸」，成為流離失職之人。王夫之說：

「秦滅王侯，獎貨殖，民乍失侯王之主而無歸，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俠遂橫行于天下。」（《讀通鑑論》）⁵

結合荀悅所論的三游者，毋庸置疑，游說、游行之士出於「辨知之士」；而俠客則出於「勇力之士」，出於那些不甘息聲田畝，老死溝渠的豪縱不羈的勇力之士，他們的文化素養不高，很難在上層建築領域內有所建樹，但他們同樣地希望實現輝煌的人生，希望建立不朽的功業，希望獲得社會的普遍認同與尊重。他們大多好以奇言奇行邀引世譽，以奇志奇節立威樹名，對社會常規和世俗常理的抗拒，使得他們起越於繩檢之外，而擁有一份自我解放，隨心所欲可逾矩的快感。並且為了充實和加強這份感覺，他們在被拯救者或一般社會人群面前樹立一種英雄形象，他們不惜通過由保持與外人的心理距離、行為距離所獲得的神祕感來維持這種感覺的永恆存在。⁶就客觀方面來說，一般社會人群大多安於弱小，藉著期盼超人出現代為決斷是非，實現理想中的正義心理，也願意看到並接受有一個由裡到外都異於常人的拯救者，亦樂於宣揚他們的異事奇行。至於他們的橫行不法，時捍文網，只要尚未危及自身，人們也會治在非享利者的角度指手稱快，從中獲取一種心理代償的滿足。俠客們受到這種殷勤的鼓勵，自然會更將自己的這種特性發揮得淋漓盡致。我們可以理解，像荆軻等人的慷慨悲歌，歔歔流涕，正是受到這種時代文化精神的鼓舞而展現出來的一種舉動，這是俠客們從內心深處發出的要求建立不朽聲名的吶喊。《史記》從這些歷史人物中找出了一些代表，

⁴ 參見《蘇東坡全集》下集第十一卷。

⁵ 參見清·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三。

⁶ 參見陳桐生《史記名篇述論稿》頁 218—220，266—271。

並為他們立傳，並凸顯他們「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的人格精神，和知思必報、任事而不自代其德，為求事成，可以身死而無所畏懼的氣概。在描述的過程中，司馬遷不惜以文學的筆法，將這些激情人物寫得栩栩如生，讓這些人物在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成為後代武俠小說或戲曲的素材，但司馬遷描繪這些人物時的內心世界更值得我們去探討。

參、〈刺客列傳〉所呈現的衝突及其悲劇意識

一、刺客衝突事蹟

《史記》描述先秦的俠客，除〈刺客列傳〉描寫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荆軻等五個人外，其餘具有俠客精神或行止者，則散見於其他列傳或世家、本紀的篇章中。近代學者鄭春元先生將馳聘於列國紛爭中的先秦俠客區分為外交之俠、刺客之俠、卿相之俠、諸子之俠、民間報國之俠、民間隱俠等六類⁷，藉以窺見俠客及具有俠客精神或行為者在各階層的分布情形。本節除以〈刺客列傳〉中的人物為探討對象外，《史記》其他篇章中具有俠客特質的人物亦納入探討，藉對這些人物的精神特質的剖析，從中窺探司馬遷在描述這些人物時的悲劇意識及其昇華。

〈刺客列傳〉全文共五千多字，除了描述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荆軻等五人外，連帶敘述了聶榮、田光、樊於期、高漸離等人的事跡，這些均是同質性的人物，因為他們的參與，使得刺客們的蓄積能量更能頃洩而出，爆發得更激烈。其中荆軻一人作者就用了三千多字，可以說是這篇作品的中心人物。

（一）曹沫

曹沫是魯國人，以勇力見長，魯莊公任命他為魯將，在與齊作戰時三次敗北，魯莊公被迫割地求和，然並不責怪曹沫，還是以他為將。

從《史記》對他出身的簡略描述，他應屬於自我意識與自尊甚強的失意士人，他渴望受到理解和尊重，一旦得到知遇的甘霖，便以湧泉相報。曹沫三次敗北，然而莊公「猶復以為將」，這就是莊公對曹沫的知遇，於是奠定他報答莊公的心理基礎。後來齊桓公與魯莊公舉行和好盟誓時，曹沫突然走上高台突然拿著匕首脅迫齊桓公說：

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刺客列傳〉）

在曹沫突如其來的武勇之舉的威逼下，齊桓公左右之人不敢妄動，身為五霸之首齊桓公只好同意歸還過去侵魯的土地，曹沫方放下匕首，走向高台，這時司馬遷對他的描述是：

既已言，曹沫投其匕，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

⁷ 參見鄭春元《俠客史》第一章第二節。

刺客列傳>)

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國之間大欺小，強陵弱的情況時常發生，一些遭受強國侵略的弱國外交人員在出使強國或在諸侯會盟時，能大義凜然地敢與強國抗爭，表現出俠肝義膽，他們或出於報知遇之恩，或為拯救國家危難，維護國家尊嚴，常常冒著生命危險，用武力脅迫的非常手段來反擊強國的欺陵，以大無畏的精神來向強國討回公道，曹沫即屬於這種典型的外交俠客。司馬遷在簡短的敘述中，對這位愛國、報知遇之恩的那股大無畏精神給予肯定，乃列於〈刺客列傳〉之首。

(二) 專諸

專諸，春秋吳國堂邑（今江蘇六合縣）人，由伍子胥推薦給公子闔閭，作為專門刺殺闔閭堂兄弟吳王僚的刺客。闔閭待他為上賓，殷勤接待。因吳王僚喜歡吃魚，專諸專程到太湖學習幾個月的烹魚技術，以便接近吳王僚，伺機下手。周敬王五年（前 515），吳國伐楚，吳王僚把兩個弟弟派了出去，叔父季札也到了國外。公子光（即闔閭）認為這是一個行刺的大好機會，他把士卒埋伏起來，出面邀請吳王僚到自己家喝酒；吳王僚對闔閭也早有戒心，設下了嚴密的警衛措施，身上披著堅甲，衛兵由王宮一直排到公子光家的門口。對於專諸刺殺王僚的過程，〈刺客列傳〉有段精彩的描述：

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

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

事成後，闔閭當上吳王，封專諸的兒子為卿。專諸刺吳王僚，雖屬宮廷內部鬥爭，但依照吳國「兄終弟及」繼位順序，應是闔閭當王，所以專諸的獻身行刺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專諸之死還體現了「誠信相知，願肝腦塗地」的士林準則，所以後來吳地有多處設立專諸祠，以紀念這位悲劇性的英雄人物。

(三) 豫讓

豫讓是春秋末期晉國人，他先投奔大夫范氏和中行氏家做食客，不被重視，乃改投靠知伯，受到了很好的禮遇。後來，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消滅了智伯，還把智伯的頭骨塗上漆，加工成飲用的酒器。豫讓為了報答智伯的恩情，反覆地去刺殺趙襄子。

他隱姓埋名，裝成服苦役的犯人，身懷匕首，混入趙宮整修廁所，想借機殺趙襄子。趙襄子上廁所時，發現有異狀，急忙詢問修廁的人是誰。一問才知是豫讓，趙襄子認為豫讓是義士而放了他。不久，豫讓塗漆吞炭，使嗓子變啞，毀改容顏，在街上行乞，連妻子也認不出來，目的是繼續尋機刺殺趙襄子。有一天，聽說趙襄子將外出，就潛伏在趙襄子必經的汾橋之下。當趙襄子過橋時，他的坐騎突然受驚，經搜索，抓住了豫讓。趙襄子責問豫讓，為何要替智伯如此賣命呢？豫讓回答道：「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接下來〈刺客列傳〉記載一段動人心弦的對

話：

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

豫讓用鮮血譜寫了一曲慷慨報恩的悲歌。司馬遷特載道：「死之曰，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

這是一個「士爲知己者死」的代表人物，友情有義，有人對他評價很高：

「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王應麟·〈史記正誤〉）⁸

但也有人給予負面評價：

「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尙足校哉！」（王安石·〈書刺客傳後〉）⁹

「且捐軀以報其主於既滅之後，孰與竭節以活其國於未亡之前乎！…故讓於報仇之義可謂盡矣，而國士之稱，恐亦不能無愧焉！」（張吉·〈豫讓論〉）

10

不過，豫讓在智伯生前是否建策抵禦三晉，已不得而知，而豫讓的刺殺趙襄子的壯舉，展現了一種不顧安危、知恩必報的俠士性格，對於後世產生巨大的影響，這是不容否認的。

（四）聶政

聶政，戰國時代魏國軹地深井里人，早年因殺人避仇，逃離家鄉，與母親、姐姐到了齊國，以屠宰謀生。當時，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仇，嚴仲子找到聶政，獻上黃金百鎰，請求聶政爲他報仇。聶政因母親尚在，擔心無人贍養因而懇辭。嚴仲子雖遭拒絕，但仍「卒備賓主之禮」，對聶政表示應有的尊重。幾年之後，聶政母親死後，聶政西行至濮陽去見嚴仲子，問清楚了嚴仲子的仇人是誰，就獨自帶劍到韓國都城俠累的公堂。他不顧持刀荷戟武士的阻擋，躍上台階，衝上大堂，一劍刺死俠累。俠累的侍衛武士們把他團團圍住，他奮勇砍殺，頃刻間砍殺數十人；但侍衛仍緊圍不放，聶政見不能甩脫，爲了不連累他人，鼓足最後的氣力，用匕首剝起自己的臉皮，挖出眼睛，剖腹出腸而死。人們根本不知道他的姓名與籍里。

消息傳出，他的姐姐聶榮知道是自己弟弟所爲，趕到韓國市集認屍，〈刺客列傳〉亦藉聶榮的一段令人動容對話來張顯聶政的人格特質：

⁸ 參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一。

⁹ 參見宋·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一。

¹⁰ 轉引自《古今圖書集成》卷八一二〈刺客部〉。

市行者諸眾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仍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

最後悲絕而死。聶榮的忠烈與弟弟相比毫不遜色。姐弟兩人，以信義爲上，堅韌不屈。無庸置言，聶政替人復仇，帶有私人雇佣性質，爲報嚴仲子的恩情，鼓勇向前，並不考慮嚴仲子與俠累之間的是非曲直；但他爲報答嚴仲子的理解、信任而犧牲自己，後人多作肯定的評價。¹¹〈琴操〉甚至把聶政之事加以神化，說聶政的父親替韓王鑄劍，過期不成，韓王把他殺了。聶政長大後知道此事，就入山求道，遇上仙人，學習鼓琴與刺術，並漆身吞炭，改變容貌。七年，學琴成功。他把匕首放在琴中，爲韓王彈奏，最後終於把韓王刺死。¹¹〈琴操〉把幾個故事情節融合在聶政身上，所刺對象不是韓相俠累，而是韓王本身，乾脆把聶政描寫成具有神術而爲父報仇的孝子。這種改寫重新塑造聶政的作品，說明了後人對聶政報人之恩、赴死不辭的義舉是持著肯定的態度。

（五）荆軻

荆軻是戰國末年齊國人，後移居衛國，曾游說衛元君，但未見用，乃游蕩於燕、越之間。在榆次，他曾與劍客蓋聶論過劍道，又與一些博徒在一起廝混，還與一個善於擊筑的樂器家高漸離狎飲。他們在燕市縱情狂歡，在酒酣耳熟之時，高漸離擊筑，荆軻引吭高歌，時而相泣，旁若無人。荆軻在燕市還結識了田光，田光善待他，知其非等閒之輩。

當時秦國大兵壓境，燕太子丹眼見亡國在即，透過田光不惜重金招募荆軻去刺殺秦王。田光爲了保密和激發荆軻的勇氣，竟「自刎而死」。燕太子丹把荆軻奉若神明，尊他爲上卿，舍上舍，滿足他的一切欲望，使荆軻十分感動，乃決定前往秦國行刺。爲了取得秦王的信任，他帶了秦王所憎恨的另一位悲劇英雄樊於期的頭顱與一張督亢地圖，出使秦國。燕太子爲了保證行刺成功，特地叫殺過人的勇士秦舞陽爲副使。臨行前，〈刺客列傳〉營造了一段非常悲壯的氣氛：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依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高漸離擊筑爲他伴奏，好友夏扶拔劍自刎，爲他送行，氣氛悲壯之極！荆軻在這悲壯激昂的旋律中，義無反顧地踏上了征程。

秦王政二十年（前227），荆軻通過秦王的寵臣中庶子蒙嘉去見秦王。上了朝廷，秦舞陽在獻圖時被秦王朝的氣勢所嚇倒，簌簌發抖，臉色頓變，荆軻忙著解釋道，秦舞陽是北邊荒蠻之人，未見世面，望大王饒恕。秦王接

¹¹ 收錄於平津館叢書漢·蔡邕撰，清·孫星衍校併輯補遺。

過地圖展開到最後，突現匕首。荆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左手抓住秦王衣袖，右手搶過匕首，對準秦王胸前刺去。可惜一刀未中。秦王掙斷衣袖，奮力跳出，繞柱躲避。秦王佩有長劍，在情急中卻拔不出來。依秦法規定，殿上衛兵不能手持兵器，所以無法還擊。這時，太醫夏無且用藥囊擊中荆軻，荆軻遲疑了一下，秦王的侍從們高叫「王負劍」，秦王把寶劍往背上一推，終於拔出長劍，對準荆軻砍去，擊中左腿。此時，〈刺客列傳〉對荆軻作悲劇英雄式的描述：

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擣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

秦王以強凌弱，吞并六國，施行暴政，因此荆軻的行刺，不僅爲了保衛燕國，而且具有抗暴意義，因此在歷史上一直受人尊敬，唐朝鮑溶〈壯士行〉：「西方太白高，壯士羞病死。心知報恩處，對酒歌易水！」詩人把他說成是太白山一樣的崇高與偉大。明朝鞏冀賢〈扁舟〉：「不讀荆軻傳，羞爲一劍雄！」認爲他是劍客的楷模與榜樣。當然，就事論事，荆軻只是一個勇敢的刺客，不可能扭轉乾坤，改變河山，所以張耒〈司馬遷論〉¹²就認爲荆軻「此特賊大夫之雄耳！」不必誇大荆軻的刺殺事蹟。但荆軻那種不顧個人安危，以死相報的犧牲精神，卻是流傳久遠的。

（六）高漸離

高漸離當是燕國人，荆軻的密友，深諳音韻，善於擊筑，荆軻刺秦王後，他隱姓改名，在河北鉅鹿酒店中當傭工，伺機再起。有次偶然聽到主人堂上有擊筑之聲，高漸離忍不住對其演奏技巧評論起來，都能切中要害。主人十分高興，叫高漸離演奏，而一鳴驚人，從此，高漸離重操舊業。由於技巧高超，應詔來到咸陽皇宮爲秦始皇演奏，甚得賞識。這時，有人認出他就是荆軻的同黨高漸離，向秦始皇報告。秦始皇珍惜他的才華，赦免之，乃下令把他的雙眼割去，仍要他擊筑。高漸離以極度的忍耐力，未露一點怨意。因此，秦始皇召高漸離演奏的次數越來越多，時間越來越長，演奏時高漸離與秦皇的距離越來越近。於是，高漸離暗中置鉛於筑中。有一天，高漸離拿著放置重鉛的筑爲秦始皇演奏，宮中衛士沒有查出，左右侍衛也未發覺異常。在演奏正熱烈時，大家出神傾聽，高漸離突然停奏，舉起手中的筑猛地向秦始皇一擊，秦始皇大吃一驚，可惜由於高漸離已失去視力，未能擊中，秦亡「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高漸離爲了國家、爲了友誼，以極大的耐力和勇氣，勇於爲燕國報仇雪恥，表現了堅韌不拔的自我犧牲精神，其生命的光彩輝煌奪目，值得後人懷念。

二、俠客勇於犧牲的精神依據

俠客的人格世界是一個內部和外部衝突的世界，它的存在既基於內心的真實

¹² 見張耒《柯山集》卷二十八，轉引《史記評林》。

體認，或落實為外在行為的舉止，但〈刺客列傳〉所蒐集的並非是同一時間或同一地點的人物，欲從中真切地掌握這些人物人格精神共同精髓，很難周延；但從描寫這些人物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從其中的交集歸納出司馬遷所欲凸顯的俠客精神依據為誠信和報知遇之恩，以及奠基在前述心理基礎上所展現出來的悲劇意識，茲分別論述如下：

（一）誠信

司馬遷在〈游俠列傳〉中，將「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總結為「俠客之義」的要件，這三個「必」字，正點出了俠客在與他人相處時，對自己言行負完全責任的特點。

如前所述，俠客的產生主要是失職的武士，他們被迫從原來所依附的政權體系中拋離出來，他們渴望實現輝煌的人生，希望建立不朽的事業，當然要轉向其他的社會力量或相同氣質的個體尋求依賴和援助，求得在這「爭於氣力」的世界上自固自立。在這種情況下，投靠新崛起的各方政治勢力，當然不失為一條出路，只要那些權貴豪強能提供他們起碼的生存條件，提供足以證實他們生存價值的利祿功名，以及相知、信任這些溫情脈脈的面紗，他們是樂於為人所用的。我們也發現，這些俠客好交游，他們有一股非常強烈的群體歸屬感和自我認同感的情感需求，他們縱橫市閭，寄跡鄉曲，相互間交通聲氣，結成黨羽，。平居以互壯聲勢、有急難則奔走赴之，互相營救，生死與共，這當然是一個生存需要的基本問題；但當我們進一步深入探討其尚游好交的動機，不難發現，其中有一種張揚獨特人格，只求在共同信仰、理想的基礎上相知相重，以獲得榮譽回報的情感需求，他們的行事就建立在這樣的心理原則下而塑造出他們風格和信譽，其具體的表現就是尚信和報恩。

「信」在中國的早期社會就已是一項極富實踐意義的道德規範，孔子將朋友之間的信作為每日自我反省的三大內容之一。到了孟子時，「信」更被確立為五倫關係中專門處理朋友關係的基本原則。¹³但是俠客所講究的「信」，在內涵上與儒家有很大的差別。俠客尚信，最主要的特色在於絕對地重然諾，不管答應了什麼，為某事而效命，都要求絕對地、毫無保留地兌現，其嚴苛的程度，甚至到了不惜生命代價的地步，這也是他們大多數步上悲劇的重要因素。但站在儒家的立場來看，有比承擔個人之間的諾言更為重要的責任和義務，那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等社會公義，一旦朋友之信與對國家、宗族的責任義務產生衝突時，「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上〉）。因此，俠客們以宗教般的熱忱在實踐他們的諾言時，儒者也許不見得認同；但儒者往往在理想社會中塑造理念，不見得可以落實；而現實的社會所講究的信是以勢相結，為利所趨的那種相互利用，甚至翻雲覆雨。所以當俠客們能脫棄世俗的功利人格，展現出「言出必行」的光輝時，往往會博得「一諾千金」、「一言九鼎」、「諾重丘山」之類的贊辭，從中可以窺見，一般百姓對於人與人之間建立起一種信任關係

¹³ 如梁惠王篇：「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盡心篇：「可欲謂之善，有諸己謂之信。」《孟子》將「信」視為道德觀念的次數達 10 次以上

的強烈渴望。

俠客這一特殊的社會人物，在其社會背景下就將這種絕對的「信」作為自己的人格核心，他們強調和高揚個體的道德力量，將人們心目中理想人際關係身體力行，使整個社會風氣不至太澆薄，使人們的人際關係朝向至善的發展成為可能；尤其俠客們所展現的「誠」是一種無條件的絕對忠誠，既不尚差等（然往往也無是非之心），只要一旦訂交，則生死以之，絕不後悔。這樣的誠信原則，對在一個「緩急人之所時有」的社會，急切期待援救的民眾而言，自然就有一種強大的號召力和凝聚力。司馬遷對俠客這種「尚信」的風節予以高度的評價，它對後代俠客的影響是深遠的，如清末反清志士余通「少負氣任俠，稍讀書」，「深慕荆軻、豫讓為人」；成為殉難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斗酒縱橫，抵掌游俠之傳」¹⁴，顯然是受到過去俠客精神的感召。正是他們代代相繼，遵信而不違，終於使俠者的人格凸顯其輝光，卓然特立於一般社會道德聲譽之外，向一切狡黠委頓展示出超脫風俗的魅力。

（二）報知遇之恩

俠客以相知相重為交游的情感原則，以誠信相與為交游的發生原則。由此，他們在行動中高揚端直梗正的品質，在人格特徵方面，自然透發出不同凡俗的敦厚與高潔。不過，倘說俠客行事從不與實際得失取予發生關係，也未免言之過甚，只不過他們對此類問題有其特殊的理解和特別的處理方式——那就是對待得失取予，總求恩怨分明，報償不爽，這可視作其交游的利善原則。

得失或取予，所涉及的是報償問題，就俠客而言，就是報得或報怨的問題。俠客於這個問題的處理上，可謂磊落分明，並由此磊落分明向世人所標舉的豪邁性情和卓越人格，也顯得格外分明。具體而言，在俠客的觀念中，受人滴水之恩，必當報以湧泉；反之，有怨仇未了，雖粉身碎骨，必求報還，所謂「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于是嘗有得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史記·欒布列傳〉)，這不僅是欒布個人的意願，也是歷代俠客的共認。就根本而言，有德必報可以追溯至中國古代的傳統倫理規範，《詩經》中就已有「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之說；〈禮記·曲禮〉中也有「務施報」和「禮尚往來」的講求。有德不報為負德，不僅非禮，而且被人認為可恥。所以小人懷惠，故人念舊，總以惠不可棄，德不可忽忘為信條。不過俠客於此信條，實施得最為徹底，執行得最為無條件，也最為完美。他們一朝受人恩惠，則報生以死，報死以力，必也退避苟且，正所謂「感君恩重許君命，泰山一擲輕鴻毛」(李白：結車之子)，雖肝腦塗地，灰軀糜骨也無所忽悔。有時所謂感君恩重，不過是蒙人知遇看重，盡管如此，他們仍會終生銘感。人有急難，即以身赴之，最典型的就就是豫讓，他不惜漆身吞炭，謀刺趙襄子，理由也是這樣的直捷和簡單：「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仇而死」，「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戰國以降，此風相沿不衰，秦末韓信受知於蕭何，投放劉邦，蒯通在韓

¹⁴ 參見鄭春元《俠客史》頁266。

信封爲齊王後，曾勸他造反而與劉、項鼎足爲三，然韓信則以「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而婉拒了蒯通的力勸，這些均是俠客報恩精神的延續，降至兩漢重視倫際，篤於恩義，薦舉多視其人能否知義報恩而定，一般士人多注意行此大節，俠客自然更不必說了，蔚爲風潮，故《史記》乃有〈游俠列傳〉之作。

三、刺客列傳中的悲劇意識

如前所述，戰國時代是一個剛健奮發，人格力量大發揚的時代，不同層次的士林人物都想在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等方面慷慨立功，力圖在最大的程度上將自己內在的價值對象化，藉此獲得社會對自身價值的認同，並獲得普遍的尊重。刺客們一般文化素養不高，很難在上層建築領域內有所建樹；但他們同樣希望實現輝煌的人生，希望建立不朽的事業，希望獲得社會的理解與尊重。此時此刻，他們的心田有如一片荒漠，殷切地渴望知遇甘霖的滋潤，他們是否有機像展現他們的志向，是否可以爆發他們蓄積已久的能量，關鍵就在「知遇」這個條件上。

從〈刺客列傳〉的描述中，我們發現一個現象，刺客們對於所受託之事不輕易接受，他們一定要看清自己是否真正地得到知遇，對方是不是知己；換言之，先覺條件是建立在人格的尊嚴上。雖然知遇也離不開一定的物質條件，如嚴仲子擬請聶政刺殺韓相俠累時，親自登門數次，「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溢，前爲聶政母壽。」荆軻被燕太子尊爲上卿時，「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但這些物質條件並不是主要的因素，〈刺客列傳〉中所凸顯的是在於刺客們回饋主人的「知遇之恩」：

（一）曹沫爲魯將，多次喪師失地，而魯莊公知人善任，「猶復以爲將」，這就是魯莊公對曹沫的知遇。

（二）專諸是吳國堂邑人，伍子胥知其能乃推薦給吳公子光。吳公子光告訴專諸，自己才是吳國真正的王嗣，專諸認同之後，認爲吳王僚該殺，公子光乃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這句話拉近了主、客之間的關係，二者成爲一體的關係，專諸傾全力回報，就在於這股知己的感覺。

（三）豫讓，晉國人，豫讓與智伯的關係頗具時代特色。智伯並不是出於個人的報仇目的而善待豫讓，他之尊寵豫讓是出於自己對豫讓的欣賞，而豫讓也以死來報答智伯。當趙襄子殺死了知伯，並漆其頭以飲器時，豫讓遁逃山中，道出了刺客們共同心聲：

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

後來行刺一次不成，趙襄子乃責問豫讓道：

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

智伯亦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

這個質問極有意義，試觀豫讓的答覆：

「陳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這裡說明了刺客亡命行刺並子是出於君臣大義，而是出於知己關係，這與「君辱臣死」履行君臣的綱常不同。智伯了解豫讓，使豫讓的人生的價值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豫讓則以自己的鮮血與生命來報答知遇之恩，其著眼點就在於「知遇」之上。

聶政爲嚴仲子報仇的事蹟雖不同於豫讓自動地爲主人報讎，然爲感知遇之恩而不惜以身相許的報答模式則是一致的。

（四）聶政，戰國時代魏國人，早年因殺人避仇，逃離家鄉，與母親、姐姐到了齊國，以屠宰謀生。當時，韓國嚴仲子與丞相俠累有仇，仲子找到聶政，數度登門造訪，並以重金請求聶政爲他報仇，聶政以贍養老母而辭謝，嚴仲子並未因爲聶政不願以身相許而拂袖辭去，而是通過「備賓主之禮」對聶政表示了應有的尊重，這明示了嚴仲子與聶政的關係並非赤裸裸的金錢與生命的買賣關係，其中更重要的是嚴仲子對於聶政的理解，正是這個理解才能聶政以死相報。〈刺客列傳〉通過聶政的獨白而淋漓盡致地傾訴了他的內心世界：

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萬，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之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

聶政所表露的是一位下層士林的心聲：自己地位卑微，而對方以卿相之尊與他交歡，將關係重大的復仇之事委托於他，這個事實本身就是對他最大的理解、尊重和信任，所以他必須爲嚴仲子這位知己者所用。聶政本是一位以屠宰爲業的市井小民，多年沉淪在社會最下層，人們均以屠戶來看待他，實際上聶政是一位具有英雄情懷的人，他雖然混跡於市井之中，但胸中卻激蕩著時代的風雲，澎湃著建功立業的激情。嚴仲子不遠千萬在稠人廣眾之中找到他，以黃金百溢爲他老母祝壽，與他執賓主之禮，這使他感到自己受到了尊重，人生價值獲得了肯定，聶政辭去了重禮而決定報答嚴仲子，這表明了聶政的著眼點是在於義而不在於利，是在於精神的滿足而不在於物質的誘惑，這是司馬遷在〈刺客列傳〉中所凸顯的精神特質。

（五）荆軻是齊國人，後移居衛國，曾在衛元君面前游說未用而游蕩於燕、趙間，與高漸離、田光相交，沉著好書，且時常洋溢著英雄的激情，是刺客列傳中的代表人物。

荆軻受知於燕太子的關係迥異前述的聶政和嚴仲子的關係。聶政和嚴仲子是

建立在主、僕之間的知己關係，而荆軻和燕太子丹的關係則拉高了一層，是建立在對國家存亡的認知上，其行事亦較前述之刺客亦來得壯烈，尤其在司馬遷的利筆下，將荆軻塑造成一位具有藝術氣的慷慨悲歌之士。

荆軻受知於燕太子丹，其中的關鍵人物是荆軻的知交田光。

〈呂氏春秋季秋紀知士〉：「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之與馬相得，則然後成，譬之若枹之與鼓。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在戰國時代，一旦刺客認定他受到某位恩主的知遇，他們即忠於所托，言信行果，甚至不惜亡命報恩。刺客們的生命實際上在他接受禮遇的那一刻就已經不屬於自己，而交給那位恩主了，因而悲壯的報恩方式就一幕一幕地搬上歷史的舞台。

總之，曹沫在盟壇上冒著被殺的風險劫持齊桓公，在外交場合上收回戰場上失去的土地，以此來報答魯莊公的知遇之恩。專諸不負公子光之托而刺死了王僚，而自己也壯烈的犧牲了。豫讓則以慘烈的方式報恩，他先是改名換姓化裝為刑人，入宮塗廁以圖行刺趙襄子，結果未能如願，趙襄子亦體諒他的義行而避他。不久，他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改變了自己的形貌行之於市，連妻子也無法認出。他的朋友勸他不妨委質而臣事於趙襄子，然後再伺機下手，何必殘身苦形。但他卻以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而不為，最後行刺還是失敗，趙襄子派兵包圍他，這時豫讓提出了要求：

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

豫讓以死報恩的精神也使對方為之動容而深致敬意，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豫讓用鮮血與生命譜寫了一曲慷慨報恩的悲歌。

聶政的亡命行刺，在司馬遷的筆下更是慘不忍睹，他婉拒了嚴仲子車騎壯士的協助，隻身前往履行任務：

仗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訣眼，自屠出腸，遂以死。

聶政為了不連累他人，自毀身體以圖滅跡，司馬遷意猶未盡，繼續描述聶政的姊姊聶榮為他亦壯烈犧牲。韓國將聶政暴屍於市，懸賞辨認，聶榮不畏斧鉞之誅，千里赴韓認伏屍而哭，市人勸她避禍，她說：

政所以蒙污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擇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

聶政為報答知己之恩而死，其姊不忍湮沒其弟的壯舉而慷慨解囊犧牲，「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聶政的報恩舉動本來就怵目驚心，聶榮之死

更塗上一層悲壯的色彩，戰國時代刺客們最悲壯的一幕在此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刺客列傳中是以荆軻刺秦王為整篇文章的核心，連帶也敘述了荆軻的知遇—田光、樊干期、高漸離的英勇事蹟，司馬遷首先以老壯士的自殺來激勵荆軻來揭開這齣悲劇的序幕，繼而樊干期將自己的頭顱獻給荆軻，作為荆軻見秦王的見面禮，又一位英雄的血為協助荆軻刺秦而增添了悲壯慘烈的氣氛，整篇文章的氛圍到燕太子丹在易水上送行時達到最蕭索，悲壯之舉動蓄勢待發：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荆軻到了秦廷，神情自若，和秦舞陽的怯場成為強烈的對比。然荆軻的鎮靜，那只是暴風雨的寧靜，當獻上燕督元之地圖時，則依其計畫行刺秦王，使得秦王張惶失措，連劍都拔不出來。可惜荆軻第一次下手未能觸及秦王，導致在秦廷內演出一場追逐戰，奈何正當關鍵時刻：

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擗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

荆軻就這樣壯烈犧牲了，臨終前的倚柱而笑，箕踞罵人，在在顯現出英雄本色，最後一息仍忘不了報答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荆軻死後，其知己高漸離又藉機舉筑擊秦始皇，以此來為荆軻復仇，繼續完全悲劇的最佳一幕。

這些英雄們前撲後繼地奉獻自己的性命，而激勵他們去自殺的，去行刺的就是士義，即為知己者死的大義。司馬遷在論贊中高度肯定了刺客們捨身報恩的精神：

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也，豈妄也哉！

這些刺客一旦遇到知遇便要報答；而一旦他們應諾恩主就會全力以赴，不惜以鮮血生命以及種種難以想像的手段來實踐他們報恩的目的，司馬遷對於他們這股壯烈精神著墨甚深，把刺客們的悲劇情懷發揮到了極致，千載以來，這些英雄人物尚活在讀者的腦海中，令人迴盪不已。

肆、《史記》在漢代游俠所呈現之衝突及其悲劇意識

秦王朝統一天下之後，俠客失去了活動的環境。秦王朝驟然滅亡，社會又處於動蕩之中，原來隱匿起來的俠客又活躍起來，同時又滋生出大量的俠客。漢代繼戰國之後出現了任俠的高潮，依〈漢書·游俠列傳〉所載，當時「俠者極眾，

而無足數者」。從漢初到西漢武帝年間，是中國歷史上任俠的極盛時期。

漢俠的活動與春秋戰國的俠客有所不同。春秋戰國時代的俠客大部分參與政治活動，生活在政治舞台上；而漢俠有很多走入民間，其行俠的行為主要是救人性命，藏亡納死，調解糾紛，或替人報仇等，其行事往往與官府的法令抵觸，因而時常招致統治者的鎮壓。然與春秋戰國的俠相比，漢俠有更顯赫的名聲，有極高的威望。很多游俠是「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比朝廷命官具更大的影響力，在社會上擁有廣大的崇拜者，蔚為風潮。

司馬遷在為游俠立傳時，矛頭亦指向活動在下層民間的閭巷布衣之俠。這類任俠沒有高貴的地位和豐厚的財產，其行俠仗義又沒有什麼貪圖，不像貴公子行俠好客的目的是為彰顯名聲和鞏固自己的權勢。卿相之俠由於有地位、財產，任俠時產生很大名聲；而閭巷布衣之俠沒有那些優越的條件，但卻能名滿天下。和前述的先秦刺客相較之，刺客所奉行的是「士為知己者死」的俠義觀念，他們主要是為有地位的權貴效力；而漢初的游俠所遵奉的是拯救人間社會之厄的俠義觀念，有更廣泛的承擔精神。他們大都不參與各種政治勢力的紛爭，而常常急貧民之所急，全力救助貧弱。他們把行俠當作生活的一部分，見危難必救，見有紛爭必去排解，幾乎到達了職業化的地步，司馬遷特為這類游俠的代表—朱家、郭解、劇孟等人立傳。

《史記》對朱家的描述，言簡意賅：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駒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隕，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游俠列傳〉）

有關他「陰脫季布將軍之隕」之情節則見載於〈季布欒布列傳〉中，朱傳之後並附帶提及事奉朱家的楚俠田仲父子。

至於對劇孟的描述，司馬遷則從側面描述他的巨大聲名：

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游俠列傳〉）

在劇孟之後，亦兼提及符離人王孟，濟南閻氏、陳周庸、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兄、陝韓孺等人。

對於郭解的描寫，在〈游俠列傳〉中佔了約一半的篇幅。郭解的父親亦為任俠，在孝文帝時被誅殺。郭解少時「陰賊，概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奸剽攻……固不可勝數。」到年長才「折節為儉，以德報怨」，乃至於「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

（游俠列傳）中以四個小情節來凸顯郭解的人格特質，其中兩則情節較為完整：

一、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弃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

二、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

游俠所追求的目標是主持人間正義，在面臨血緣親情與社會公理的矛盾時，游俠往往放棄血緣親情，頗有大義滅親的意味。郭解這種深明大義的做法，為他贏來更多的追慕者。

另一則則載郭解不願居功的人格特質，其他兩則記載郭解嚴以律己而寬以待人的事蹟，結果引來更多的仰慕者。然而聲名往往也帶來厄運，郭解之死就是聲名震主的結果。漢武帝遷富豪於武陵以利監督，郭解家本來達不上遷徙標準，但也在遷徙之列。郭解因遷徙案而與楊氏結仇，一些仰慕郭解的人們殺了縣掾楊季主，也殺了楊季主家人之上告者及譏謗郭解的儒生，由此而導致災禍愈滾愈大，最後由御史大夫公孫弘判定族滅郭解。郭解因行俠而被人企慕仿效，結果這種企慕卻讓他步上悲局。

探討司馬遷為何為這些下層人士立傳，不難從〈游俠列傳〉中的議論文字窺出珠絲馬跡。司馬遷說：

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大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災蓄，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游俠列傳〉）

其中似乎寄寓著司馬遷身世之嘆。我們隱約可以聽到司馬遷從自身痛苦的生命體驗中發出了對於救助困厄之士的深情呼喚。司馬遷因為李陵事件而慘遭腐刑，他拿不出巨資來贖罪，昔日的朋友避之猶恐不及，朝廷公卿大夫沒有一個人出來為他說一句話。在他最需要援助的時候，卻沒有一個人伸出援助之手，這使他深深感到世態的炎涼，他從自己的不幸聯想到古今往來無數仁人志士的不幸，此時若有人挺身而出解救他們的倒懸之苦，應是夢寐以求的。司馬遷在這種同理心的推展下，意識到救士於困厄的游俠精神是多麼可貴。《史記評林》引董份語說：

史遷遭李陵之難，交游莫救，身受法困，故感游俠之義，其辭多激。

這個評點是蠻符合《史記》行文的語氣，是契合司馬遷的悲劇意識的。

此外，游俠能博取聲名是符合司馬遷及時立功、立名的人生觀¹⁵。司馬遷遭

¹⁵ 司馬遷〈報任安書〉：「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所以隱忍

腐刑，其所以隱忍完成著作，則是建立在他這項人生觀上，這和游俠們的行止具異曲同工之妙。

司馬遷對於那些勇於展現自己，而能在歷史的舞台上留下聲名者，不管其貧富貴賤，均一視同仁地給予立傳，尤其更留意下層士林的功名業績，因為下層士林活動的舞台很小，欲建立功業遠比達官貴人困難得多，就以游俠來說，司馬遷就有意的將之區分為貴族之俠、匹夫之俠與豪暴之俠，豪暴之俠「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這類司馬遷是不屑一顧的；反之對於匹夫之俠與貴族之俠，則司馬遷較為看重，他說：

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游俠列傳〉）

從這段見解，我們不難發現司馬遷的人格特質中具有好俠成份，他能站在歷史的縱深中，捕捉真正影響歷史的人物，他注意到了廣大人民的需求、他們的情感，關注他們的吶喊與價值，並抱著極大的熱情去歌頌這些下層人物，這是悲劇意識的昇華，感人至深。司馬遷以深情呼喚赴士之厄困的俠義精神，熱烈禮讚游俠捨己為人而不圖報答的高尚情操時，但卻發現「儒、墨皆排擯不載」，他們的名字幾被歷史所遺忘；更有甚者，統治階層還往往向他們高舉屠刀。司馬遷為此悲憤填膺，他要為這些民間英雄抱打不平，他要讓俠士的光輝永照丹青，可惜他所能捕捉的還是少數；然「游俠列傳」已足以稱為匹夫之俠的豐碑，同時也展現了司馬遷悲憫人格的真實寫照。

伍、結語

俠客有異於常人的精神和情懷，他們往往不受世俗的規範束縛，放任不羈，恣其所為，一切言行舉止均依自己的好惡作為取捨，甚至表現出驚世駭俗的怪誕行為，為追求心靈的自由，放任地凸顯其豪邁不羈的個性。但是從他們的行事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們有某些精神特質，如高標出世的價值取向，摒棄尋常百姓安居樂業的生活信念而渴望轟轟烈烈的人生，期盼實現生命的最高價值，為了實踐生命的價值，他們可以毅然拋棄生命。司馬遷掌握了在這一種精神特質，以其飽蘸情感之筆充分渲染這些市井俠客輕生死的凜然大義。在司馬遷的刻劃下，這些俠客的身上閃現出睥睨生死的悲烈精神，使得他們這種高標出世的價值取向綻放出眩目的光彩。

此外，俠客恪守的俠義規範常常超越常情，他們在人格上一旦找到知己，對於承諾之事必定冒死以赴，並且極端恪守報恩的觀念。有些俠客甚至將這些標準提昇，對於他人的施恩不忘報，自己施恩他人卻不望報，甚至拒報、躲報，表現

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不於後世也。」

出更為高尚的道德境界。馮友蘭先生在《新事論》中說：「所謂行俠仗義的人所取的行爲標準，在有些地方都比其社會道德所規定者高。…施恩不望報是道德的行爲，施恩拒報即是超道德的行爲了。」司馬遷在〈游俠列傳〉中所凸顯的就是這種高尚的俠節特質。

司馬遷的人生是一個悲劇，從〈報任安書〉中可以感悟出他那股超越生死的人生價值取向。「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這種精神特質和俠客的心聲是異曲同工的，所以能引發司馬遷深刻的共鳴。他充分地掌握了這些俠客的性格特徵，將這些位居下階層俠義之士的悲劇情懷發揮得淋漓盡致，讓他們重現在歷史的舞台上，可謂是俠客們生前所料想不到的知音者。司馬遷之「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後世也」，從對俠客的描述可以窺見他的人格特質及其內心世界。

陸、參考文獻

1. 陶希聖 1930 辯士與游俠，商務印書館，上海
2. 凌稚隆(輯校) 1968 史記評林，蘭臺書局，台北。
3. 張蔭麟 1971 中國上古史綱，華崗出版有限公司，台北。
4. 裴駰、司馬貞、張守節 1975 史記三家注，洪氏出版社，台北。
5. 蘇軾 1975 蘇東坡全集 河洛圖書出版社，台北。
6. 王夫之 1984 讀通鑑論 漢京文化事業公司，台北。
7. 余英時 1987 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
8. 司馬遷 1988 史記(百衲本二十四史)，台灣商務印書館，台北。
9. 梁啓超 1989 中國之武士道(收錄於飲冰室合集)
10. 張法 1991 中國文化與悲劇意識，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11. 劉若愚 1991 中國之俠，三聯書店，上海。
12. 李寅浩 1991 《史記》文學價值與文章新探，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13. 許蘇民 1992 歷史的悲劇意識，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
14. 鄭樵生 1993 司馬遷的世界 志文出版社 台北。
15. 楊建文 1994 中國古典悲劇史，武漢出版社，武漢。
16. 張大可 1994 司馬遷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南京。
17. 張志和 1994 中國文史中的俠客，中國社會出版社，北京。
18. 鄭春元 田昌五 1994 中國歷代游俠，河南人民出版社，河南。
19. 曹正文 1994 中國俠文化史，上海文藝出版社，上海。
20. 陳桐生 1996 史記名篇述論稿，汕頭大學出版社，汕頭。
21. 韓兆琦 1996 史記通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廣西桂林。
22. 陳桐生、劉懷榮 1996 忠烈人格，長江文藝出版社，武漢。

23. 汪湧豪 1996 游俠人格，長江文藝出版社，武漢。
24. 楊柳 1996 先秦游士，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
25. 楊寬 1998 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
26. 陳夢雷 1999 古今圖書集成，鼎文書局，台北。
27. 戈春源 1999 刺客史，上海文藝出版社，上海。
28. 鄭春元 1999 俠義史，上海文藝出版社，上海。
29. 張大可等 2005 史記研究集成，華文出版社，北京。
30. 王冉冉 2006 史記講讀，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上海。
31. 韓維志 2006 上古文學中君臣事象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32. 劉榮傑 2008 史記悲劇意識發微 2008 南台灣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33. 王應麟 1999 困學紀聞，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34. 吳見思 2008 史記論文，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35. 李景星 2008 史記評議，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The Study on the Chivalries Conflict and Tragic Consciousness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by Ssu Ma-Chien

Rong-Jye Liou

Li-Shan Chen

ABSTRACT

This paper contains five unites. The first unit gives a definition to the chivalry, and explains the method of this study. The second unit studies the behavior of chivalry which can investigate the writing purpose of Ssu Ma-Chien. The third unite studies the conflict events of the Warring States assassins, then we can find the tragic consciousness sent out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this unit concludes the sacrificial spirit of assassins was depended on the trust and to repay another's kindness which have the social necessary and infect the descendants. The fourth unit studies the conflict events of the West Han chivalries, in spite of having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background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they always had presented their special spirits, and obtained the high reputation. Compare with the assassins of the Warring States, they were killed by the ruler, but the assassins were killed by the objects whom they want to kill. Both of them had the tragic fate too. The fifth unit is conclusion. Under the describing by Ssu Ma-Chien, the chivalry's spirit of patriotism was sent out deeply, because Ssu Ma-Chien had the tragic suffering, so he could touch the mind of chivalries. By this studying, we can investigate the one corner of Ssu Ma-Chien's mind world.

Keywords : chivalry, biographic sketches of assassins, biographic sketches of traveling champions, conflicts, tragic consciousness

Associate Professor, Meiho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Tagen University